

吴越佛教

杭州佛学院

编

第一卷

宗教文化出版社

吴越佛教

杭州佛学院 编
第一卷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越佛教.第1卷/杭州佛学院编.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ISBN 7-80123-754-4

I. 吴… II. 杭… III. 佛教史-研究-华东地区-文集 IV. B94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865 号

吴越佛教(第一卷)

杭州佛学院 编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21(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雪梅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本记录: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3.5 印张 395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80123-754-4/B·343

定 价: 48.00 元

前 言

吴越佛教历史悠久,高僧辈出,影响深远,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天台宗的创立,禅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的发展,乃至近代“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都与吴越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了对吴越佛教的历史、教理、教派开展研究,发掘其深厚的文化资源,我们于2003年9月25日至9月28日举办了首届吴越佛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就“吴越佛教”的定义、基本特征、宗派特色及主要人物,展开了讨论,会将论文结集出版,定名为《首届吴越佛教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时隔一年,恰逢五代末高僧永明延寿大师诞辰1100周年。延寿大师毕生潜心佛学研究,倡导融合各宗派教理,主张禅教一致、禅净合一、禅净双修,对宋及以后中国佛教的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为缅怀延寿大师的德风,弘扬其文化遗产,我们于2004年11月10日至11月12日举办了第二届吴越佛教与社会学术讨论会,邀请佛教界高僧大德及专家学者作专题研讨,论文集也在会后正式出版,定名为《永明延寿大师研究》。

自五代以后,吴越地区渐成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所在,南宋官廷评定天下禅林的“五山十刹”,多集中于杭州一带;佛教各宗大德高僧的活动足迹,亦遍及杭城;更有远洋而来求法的异国僧人,也在这片佛国净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们不仅为中国文化、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佛教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韩两国的佛教交流,早在东晋时就已经开始,至宋代更为密切,更有高丽僧统义天大师入宋求法。义天(1055-1101)大师,是高丽国国王文宗的第四子,11岁时礼高丽国灿圆国师出家为僧,后受封为祐世僧统,是当时高丽国的一代名僧。高丽宣宗二年(1085),义天为了两国之间的佛教交流,乘船取道东线入宋,

于同年五月在密州登陆后,开始了他在宋朝 14 个月的游访问法活动。义天在中国求法的这段时间,在杭州慧因寺净源法师门下学华严教理就有一年之余,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义天回国后,为报师恩,曾数次捐助修建慧因寺,赠送华严大经,修建华严阁等,以至后人都称慧因寺为高丽寺。义天的此次入宋求法,是中韩两国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也是中韩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影响和意义,重大而深远。为纪念义天大师诞辰 950 周年,发扬义天大师的崇高精神,发展中韩文化交流,我们于 2005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11 日,举办了第三届吴越佛教与社会学术讨论会,邀请韩国、日本及国内学者参加,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实地考察了高丽寺遗址和正在重建的高丽寺新址,并进行中韩茶道交流等活动。我们将此次会议的论文编入这次出版的《吴越佛学》第一卷。

杭州佛学院致力于佛教学术研究多年,已取得一些成绩,但百尺竿头,更进一层,还需作不懈的努力,希望继续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大力支持。

杭州佛学院

2006 年 3 月 20 日

目 录

1	前 言
	— 上 篇 —
2	陈景富:义天人宋求法活动及其弘法业绩
28	崔锡焕:大觉国师义天的茶禅一味论
32	金健人 林阅春:高丽寺重建与中韩文化交流
40	魏常海:大觉国师义天的“圆融”思想
48	陈荣富:略论中韩佛教文化交流
57	黄夏年 朴永焕:高丽义天来华在何处登陆
71	鲍志成:关于高丽寺历史和重建的若干问题
86	池逵模:大觉国师与宋诗文化的交流
111	李炯石:大觉国师义天诞生地研究
113	高荣燮:义天的天台观
132	李永子:义天僧统与天竺寺观音参拜及赵孟頫 的观音院记
141	崔箕杓:大觉国师显彰事业与现况
149	上岛亨:义天时代的日本佛教

一下 篇一

- 156 横内裕人:高丽续藏经与日本中世佛教
- 175 蔡日新:法眼大师 禅宗巨匠
——永明延寿禅师述禅
- 205 陈 坚:永明延寿论“名”
- 215 李明友:太虚论永明延寿
- 220 黄夏年:太虚大师的与时俱进思想初探
- 231 释如拯:论《坛经》中的心性之禅
- 247 董 平:论大慧宗杲
- 263 慧 仁:略论唯识三自性
- 270 张化蒙:瑜伽唯识学心意识之探究
——以《解深密经·心意识相品》为核心
- 299 理 净:三论宗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思想概述
- 314 照 贤:略辩南山律之戒体论
- 324 韩廷杰:隋朝时期的佛经翻译
- 340 张家成:论叶适与佛教的关系
- 346 刚 晓:佛教肉身现象简论

—附 录—

- 356 王雷泉:第一届吴越佛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总结
- 361 董 平:第二届吴越佛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总结
- 367 铂 净:第三届吴越佛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总结

論業者及其與商者對未來人頭之

家分第 國華林業社編輯

上 篇

論業者及其與商者對未來人頭之

論業者及其與商者對未來人頭之

業者之地位，在社會中，固極重要，且其與商者之關係，亦極密切。業者之地位，在社會中，固極重要，且其與商者之關係，亦極密切。業者之地位，在社會中，固極重要，且其與商者之關係，亦極密切。

業者之地位，在社會中，固極重要，且其與商者之關係，亦極密切。業者之地位，在社會中，固極重要，且其與商者之關係，亦極密切。業者之地位，在社會中，固極重要，且其與商者之關係，亦極密切。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第 一 頁

义天人宋求法活动及其弘法业绩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陈景富

义天是韩国高丽王朝时期的著名高僧，曾于宋元丰末（1085年，另一说为元祐初，即1086年）入华求法，成绩卓著，在中韩两国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他担任高丽国僧统，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数十年，贡献弥多，其编纂、著述惠及今人，是一位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颇大影响的人物，因此特辟专章讨论。

一、义天生平略述

义天，俗性王，名煦，字义天，因避宋哲宗皇帝讳，以字行。其父为高丽文宗王徽，母仁睿顺德王后李氏。史载，李氏梦龙入怀而有孕，于文宗九年（1055）生义天于宫中，时有香气郁然，久之而散。义天兄弟九人，他自己排行第四，在顺宗、宣宗、肃宗之后；妹二人。义天“自幼超悟，读书属辞，精敏若宿习，兄弟皆有贤行，而师杰然出锋颖”（《灵通寺大觉国师碑》）。稍长，行艺“俨若成人”（《仙凤寺大觉国师碑》）。至11岁，有出世志，遂从父愿，出家为僧，为国作福田利益。仁睿王后以孕时梦贵，本意并不想让义天出家为僧，但见业已受君命，亦无可奈何。是年五月，文宗诏王师烂圆为义天祝发，并令随师出居灵通寺。十月，就佛日寺戒坛受具。义天出家后，一直随侍烂圆，习华严学。文宗二十三年，受封为“广智开宗弘真祐世僧统”。自此起，义天正式步入了其弘法利生的新阶段。至年甫壮，学习“益自勤苦，早夜矻矻，务博览强记，而无常师，道之所存，则从而学之。自贤首教观及顿渐、大小乘经律论章疏，无不探索。又余力外学，见闻渊博，自仲尼老聃之书，子史集录百家之说，亦尝玩其菁华而寻其根柢。故议论纵横驰骋，衮衮无津涯，虽老师宿德，皆自以为不及，声名流闻，时谓法门有宋□矣”（《灵通寺大觉国师碑》）。事实上，正是由于义天坚持诸宗兼研、全面继承以及即释即儒即道的学习实践，从而为其独具特色的佛学思想之形

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丽文宗三十年(1076),景德王师烂圆归寂,义天继承其华严学讲席,独立地担负起弘法之重任。次年,正式开讲贞元新译《华严经》并《疏》50卷,当年彻轴。自后,讲宣未有一日废。文宗末年,随着北宋与高丽两国关系的重新正常化,义天开始与宋朝杭州高僧净源取得联系,萌生西入中国游学之愿望,并终于在高丽宣宗二年(1085)四月至次年五月付诸实施,从而在他人生和事业的道路上跨入了一个更新、更高的层次。此事意义重大,下节专门叙述。

义天求法还国后,奉国王命任兴王寺住持,一面宣经说法,一面禅思晏如。同时与在宋朝结识的善知识保持密切联系,通过书信往来,继续交流佛教诸宗章疏典籍。高丽宣宗四年,即宋元祐二年,宣宗、仁睿太后并义天以青纸金书三译《华严经》180卷赠送杭州慧因寺。宣宗六年,即宋元祐四年,宋净源法师周年忌日,义天遣门人寿介等至杭州慧因寺主祭净源。宣宗七年,义天在宣宗的支持下,将业已收集到的诸宗教藏章疏在刊正舛谬后,交由设在兴王寺的教藏院刊刻流通。宣宗八年,义天出游国内诸寺,进一步收集诸宗教藏,同时继续向宋朝、契丹(辽)、日本购求之。宣宗十一年(1094),顺宗生前之愿寺弘圆寺落成,义天迁住于此,教学如故。

不久,宣宗将卒,王位继承出现隐争,义天于是退居伽耶山海印寺,以免陷入权力争夺的矛盾中。宣宗既卒,献宗当国,二次诏请义天还住京寺,义天终不赴。次年(1095)十月,肃宗禅王位,亦数次派专使奉敕请义天还京,义天仍然辞之不赴。至第四次敕请,义天这才因“备礼厚辞,义不可拒”(《灵通寺大觉国师碑》)而离山寺还京,复居兴王寺教学如故,时为高丽肃宗元年(1096)。在退居海印寺期间,义天着重研习法相唯识学,撰成《成唯识论单科》三卷并《序》。

高丽肃宗二年(1097),仁睿太后生前愿寺国清寺建成,义天被任命为住持,并在此初讲天台教,从而开创了韩国佛教之天台宗。当此之时,高僧德麟、翼宗、景兰、连妙亦各率其徒投义天门下,同弘此宗。此外,义天还在寺中讲华严《搜玄记》,还有《兰盆经》、《遗教经》、《隐子》等。弘法之同时,义天还关心国计民生大事,上《铸钱论》,极劝肃宗在全国颁行铸钱、用钱之法令,以利国利民。此外又随从肃宗至三角山相迁建新都之地形。至肃宗五年,义天终于积劳成疾,但仍讲学不辍。次年十月五日,义天右胁而化,终于走完了他短促而又辉煌的生命历程,俗寿47岁,僧腊36夏。肃宗赐谥“大觉”之号,册为国师,又设《仁王经》道场,与群臣皆玄冠素服,辍朝三日而追悼之。后将骸骨起塔于五冠山灵通寺。兴王寺、仙风寺亦建塔竖碑以纪念。

二、义天入宋求法原因、经过及意义

义天入宋游学求法是整个海东僧人西行求法活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中韩两国佛教关系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义天入宋游学求法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义天在弘法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时当末法阶段,教纲颓弛,法义难明,须要参访善知识,澄清视听,弄明教义。这一点,义天在给本国国王的《请入大宋求法表》中说得非常清楚:“臣某智识空疏,器能庸懦”,而“道流寂尔,讲肆门臭然,遂使真趣屈于异端,玄言隐于浮伪,玩文味义,空恋于古贤,负笈横经,罕逢于善匠,若不问津于中国,实难抉膜于东方”。在给宋哲宗的《乞就杭州源闍梨处学法表》中还说:“(某)侯闾辞荣,佛乘注意,慨深文之难究,悲正法之下衰,是惜寸阴,拟探群典。向者于故国,偶得两浙净源讲主开释贤首祖教文字,披而有感,阅以忘疲,乃竖慕义之心,遥叙为资之礼。”正当义天萌发入宋游学求法愿望之时,“得大宋两浙华严闍梨净源法师书一道,其书云:因风而来,口授心传,则针芥虽远,悦高下之相投,笙磬同音,穆宫商而切响”(《上净源法师书四道》之一)。他强调说:“矧当像教之下衰,复被哲人之招引,恍无心于访道,必有息于求真。”(《请入大宋求法表》)很清楚,像教下衰,大有必要通过“访道”而求得真谛,这是义天不惜生命,渡海入宋游学求法的首要原因,而两浙华严教主净源法师之来信邀约招引,则更加坚定了其访百城、参善友之决心。

其次,至宋学习天台教观,以便在高丽国开创此一“最上真乘”法门。《仙风寺大觉国师碑》载,肃宗在藩之某日,与义天一同入宫谒仁睿太后,“偶语及之曰:天台三观最上真乘,此土宗门未立,甚可惜也。臣窃有志焉。太后深垂随喜,肃祖亦愿为外护”。在《新创国清寺启讲辞》中,义天更加明确地谈到:“缅唯海东佛法七百余载,虽诸宗竞演,众教乐陈,而天台一枝,明夷于代。昔者元晓菩萨称美于前,谛观法师传扬于后,争奈机缘未熟,光阐无由。”“贫道宿生何幸,遭遇明时,托迹空门,潜心一境,忘躯问道,委命求师,涉万顷之洪波,参法苑之善友,国清、天竺,承禀教观,佛陇、孤山,凭吊祖庙,诚心所誓,尽命传灯。”这两段话,已经把求三观玄旨、创天台教宗的前因后果说得清楚明白,无需再作补释。这是义天入宋求法游学的另一个原因。

再次,搜求诸宗教藏章疏,以备编藏,供弘法之用,垂万世而不朽。义天在求法将归国时致某法师书(已残)中这样说:“所传诸家教乘,或有绝本不行者,或有鱼鲁混淆者,或有阙于钞解者,兼以自五代至今日,向二百年,诸师著述,未见流通,所以发愤忘遐,特来求法。今被本国王催来之命,还乡在即,伏望大法师流通为急,凡有

古今诸家章疏，出目示之，贵得还乡之日，聚集今古诸家教乘，总为一藏，垂于万世，导无穷机，返本还源，是其本愿也。”（《大觉国师文集》卷10）这段话不仅道出了入宋游学求法的又一个原因，而且也剖露了其急于搜求诸宗章疏的愿望。

宋熙宁元年（1068）至三年，宋江淮两浙荆湖南北路都大制置发运使罗拯奉朝旨，两度遣商人黄慎至高丽见文宗王，表示两国应恢复旧好之意。王悦，馆接优厚（《高丽史·文宗世家》）。昔者，高丽为辽所阻，不通于宋达40余年，至此复通。登州及明州均为高丽使者入境之门户。北宋与高丽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为义天人华游学求法创造了先决条件。

文宗末年（1083），义天向父王奏请入宋求法。《仙凤寺碑》谓：“文宗但心许之，未降指挥”。不久，文宗卒，此事遂寝。宣宗元年（1084），义天再次表请越海求法，群臣以义天贵为王子，不宜越海。义天竭力抗辩，宣宗颇受感动，意欲敕准，而群臣决议，以为不可，事又罢。虽如此，义天慕善财游百城参善友之心未摧。是年七月十五日，义天在《兰盆日烧臂发愿疏》中发誓曰：“愿烧臂一炷。赖今日之良因，躬历百城，遂他年之奇遇，真风息而再扇。”其求法之心益坚。次年，义天趁宣宗外出巡察，遂择四月八日佛诞节之吉日，连夜携侍者寿介等人微服至贞州（今之金浦），搭乘宋商林宁船越海而西。义天在留呈宣宗及仁睿太后的信（即《请入大宋求法表》）中写道：“望南巡之法驾，夤恋虽深；顾西迈之客帆，云游斯切。侷俛难裁于进退，徘徊几念于因缘，揣志失图，抚躬无措，伏望主上愍臣为法，恕臣冒刑，轻万死于涉长波，委一身于到彼岸，赖之以我王盛德，荷之以吾佛冥加，炳慧焰于西使，转法轮于东返。道光重映于千古，慈风益扇于三韩，大教卷而复舒，幽旨沦而更现，则虽暂违于忠孝，冀有补于邦家，倾望宸严，实增损越。”字里行间流露出几分悲壮。宣宗知道后，甚为惊诧，一方面差遣弟子乐真、慧宣、道邻随后渡海入宋陪侍，同时又遣礼宾丞郑仅等问过海安否。义天人宋求法的随行人员，一般认为只有寿介一人，《请入大宋求法表》中则谈到“今与双溪寺大师县真等缁素共一十一人同约，欲随商客船发行”云云。

五月二日，义天越海到达宋密州板桥镇（今山东半岛之胶州）登陆，立即向密州及高密县两级地方政府致状，并上表宋廷，具述入朝之意。在等待朝旨期间，知密州朝奉郎范锴给予热情接待，先后安排于板桥镇圣寿院、密州资福寺斋宿。至是月二十一日，义天获准赴阙，主客员外郎苏注廷奉诏自京城前来引导，从此开始南下之旅（参见《大觉国师文集》有关表、状）。

六月七日，义天到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中使黄永锡来传敕旨，并赐御斋。由于旅途劳累，义天卧病，滞留海州。六月十三日，中使复来传敕旨，赐御茶20桶、药1银盒。义天先后上表谢赐御斋并茶药。病愈，过泗上（泗州，在安徽泗县东南），至普

光(照)王寺礼僧伽舍利塔。继而经宿州,达南京(河南商丘),时当七月一日。中使来传敕旨兼赐御斋。义天照例致状南京留守及地方政府。

七月六日,义天终于到达宋京开封,承蒙郊迎,获赐劳筵,奉敕住京师启圣寺(院),中书舍人范百禄为馆伴。七月二十一日,宋哲宗于垂拱殿诏见义天,待以客礼,优宠有加,赐物并斋筵,差中书舍人钱勰为押伴。次日,义天即上表乞师受业。两街僧录奉诏以华严宗法师有诚乃京城高才硕学而荐之,义天于是执弟子礼,从其习法,往返问答贤首、天台两宗判教异同及其微妙之旨。师徒二人还互赠了章疏典籍(参见《大觉国师文集》有关表、状)。此间,义天还先后参谒了相国寺之圆照宗本禅师和兴国寺西竺三藏天吉祥。其中,圆照宗本乃禅宗青原系十一世法嗣,特为义天升堂说法,并以偈赠之(《仙凤寺大觉国师碑》)。

从有诚法师相随游处学习未及一月,义天复上表奏请往杭州从净源法师研习华严学。至八月十四日,获准南下。八月底、九月初,义天离京辞行之日,皇帝复又赐斋、设钱筵,并敕朝散郎尚书主客员外郎杨杰为送伴。义天沿汴河、历淮泗、渡扬子津,达于润州金山,浸寻而至苏州,大约于九月下旬到达余杭。重过泗州普光王寺时,正逢本国宣宗生辰,义天特为设生辰斋,并撰《疏》祝福。至金山寺,参谒了名宿佛印了元禅师,赠予焚炉、袈裟、经帙。了元禅师特制诗六首答谢。在苏州,参访了圆通寺华严僧善聪法师,自此,二人的友谊延续了很长时间,多有书信往来、偈颂相赠。

义天到达余杭后,遂与净源法师相约,先到大中祥符寺(唐称龙兴寺,今存遗址)高丽王子殿内烧香,然后同往遍福寺瞻礼舍利,并由杨杰交接,定净源为义天开讲规式。地点应当就在祥符寺。元祐元年(1086),杭州知州蒲宗孟请净源入住慧因寺,开讲武则天世所译《华严经》,义天亦随师移住此寺。期间,净源欲于寺中置教藏,义天于是舍银置教藏7500余卷施之。不久,高丽宣宗上表宋廷,以母忧,请遣义天还国。此时,适值义天在杭州上天竺寺请从谏讲天台一宗经论,其弟子并主客杨杰一同听受,意欲继续滞留,踌躇不能决。从谏法师喻之以高僧道纪负经、荷母游学,经、母两不背的故事,劝义天不必为法背母而使其忧。义天听后,始坚归志,于是乃求炉拂传衣。从谏为其说天台教法,并以手炉、如意相赠,又制诗一首以送别。义天离杭北上时,特请净源同舟赴京,一路上讲学不辍。

二月十三日,义天抵达京师,哲宗皇帝于永宁禅院特赐劳迎,敕就同文馆安歇,差朝散郎试中书舍人满中行为馆伴。义天上《谢传法表》,称:“蒙敕允,寻诣杭州花严教净源所学法,今已传大旨讫。”闰二月十九日,义天入内殿向皇帝、皇太后辞行,皇帝、皇太后赐予银器、彩帛,设钱筵送别,下诏书奖喻之。三月二日,义天准备离京

南下放洋还国，仍诏差朝散尚书主客员外郎杨杰、僧可久为送伴。三月七日，宋哲宗又以高丽文宗王真影一轴、并金香炉、香盒等赐予义天。

南下途中，路过秀州（今浙江嘉兴市），义天特至真如寺参礼，见楞严疏主长水子塔亭倾圮，于是慨然以白金六十星嘱寺僧修之（《大觉国师文集外集》之《大宋重修楞严大师塔记》）。

四月，再至杭州慧因寺，净源法师继续为其传道。传迄，正坐焚香嘱曰：“愿僧统归，广作佛事，传一灯而使百千灯相继无穷。”（《灵通寺大觉国师碑》）将离杭州赴天台，城中禅讲诸师各率徒送别，并以诗、书赠之。义天则再次向诸方广求章疏，其文已见于上。此后不久，义天到达天台山，登定光、佛陇，瞻仰祖师弘法遗迹，并亲笔书写发愿文，于智者大师肉身塔前宣誓，还国之后，当尽命传扬天台教观。杨杰志之，沙门中立之为竖石。

五月上旬，义天自天台山至明州（今浙江宁波市），以僧明智、慧照馆接之。此间，特至阿育王广利寺礼谒大觉怀琏禅师，琏师为之升堂说法，并制诗一首赠别。五月十二日，义天离明州赴定海（今宁波镇海）。十九日，自定海随本国朝贺回使船放洋还国，越十日，至廿九日还至本国礼成江。宣宗奉太后出奉恩寺以待，迎接导仪甚盛。义天随即上《乞罪表》，表示“擅行之罪，虽陷严科，闻道之心，实甘于夕死”。宣宗非但不追究其“罪”，反而以文宗所建愿寺兴王寺落成至今并无主掌，于是诏义天为住持，弘演禅教显密诸法门。

至此，义天的入宋游学求法活动宣告结束。它延续的时间为14个月（闰二月），足迹及于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浙江五省，时间紧，任务多而重，但收获巨大，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具体表现在弘法和政治两方面。

首先谈弘法方面，其收获是：1、广参善知识，博见闻，长知识，更有利于日后的弘法事业。《乞罪表》中谈到，义天上献求法所得物品中，有五十五善知识像。《灵通寺大觉国师碑》载：“始自密至京，以及吴越往来……所至名名胜境，诸有圣迹，无不瞻礼，所遇高僧五十余人，亦皆资问法要。”从《大觉国师文集》残稿中，共查到与其有关系的宋僧有：板桥镇圣寿院僧澄流、光圣寺喜长老、法慧宝阁沙门元（圆）照宗本、京师觉严寺有诚、金山寺佛印了元、杭州慧因寺僧净源、仁岳、杭州上天竺寺僧从谏、姑苏圆通寺僧善聪、梵天寺僧德懋、钱塘承天寺僧守明、天台山僧唯勤、华严僧辩真、西湖讲律临坛僧冲羽、北岩山僧守长、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僧怀琏、杭州承天寺了觉大师法圆、宗喜、天台山石梁山寺（中广寺）僧希辨、律学僧择其、慧因寺僧道邻、杭州灵隐寺僧契嵩、泉州开元寺僧希湛、道亨、慧圆、行端、智生、杭州三学院僧法邻、祥符寺僧可久、希俊、慧清华严、颜显、东京显圣寺僧琳法师、善渊、开封兴国寺僧天吉祥、绍

德、四明郡僧明智、慧照、净因、利涉等。如许之多的僧人中,除个别以外,都与义天有过直接的交往,许多人都是一代高僧大德,如元照、有诚、净源、从谏、善聪、冲羽、怀琏、了元、元净、法圆、择其、契嵩、法邻等,这些高僧中,又有数人曾为义天升堂说法,有的甚至于传衣受印。有理由认为,上述数十名僧人并非其所参谒者之全部。如此广泛的游学活动,有利其佛学造诣的加深,因而也对其日后的弘法活动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义天求法中的主要伴送者杨杰是这样总结其收获的:“自古圣贤越海求法者多矣,岂如僧统一来上国,所有天台、贤首、南山、慈恩、曹溪、西天梵学,一时传了,真弘法大菩萨之行者。”义天自己在《乞罪表》中也说:“往者无贪性命,不惮艰危,涉万里之洪波,参百城之善友,备寻真教,全赖圣威,以至慈恩、贤首之宗,台岭、南山之旨,滥传炉拂,谬蕴箕裘,始同学步之人。”《仙凤寺大觉国师碑》说得更加精确:“国师自宋还国,然后诸宗之教各得其正。”主客观的评价、时人和后人的评价都是完全一致的。2、还国后首创高丽国佛教天台宗,尤其可见这次求法之功。义天在天台山智者大师肉身舍利塔前所述之发愿文中说:“尝闻大师以‘五时八教’判释东流一代圣言,罄无不尽。本国古有谛观者,传得教观,今承袭久绝。予发愤忘身,寻师问道,今已于钱塘慈辩讲下,承禀教观,他日还乡,尽命传扬。”正如所誓,义天还国后,其母仁睿太后于宣宗六年,即宋元祐四年(1089),“经始精蓝,取国清之宏制,发扬妙法,移佛陇之高风”。然“大愿未终,神游俄逝”(《国清寺启讲辞》)。肃宗登位后“遵圣善之愿怀,受能仁之付嘱”,继承先志,至其即位之第三年(1097)初,终于使寺院落成,而且也取名“国清寺”,举行了盛大的开光典礼,特任义天为住持,弘扬天台教观(《仙凤寺大觉国师碑》)。高丽佛教天台宗自此正式创立,这座国清寺也便成了此宗的祖庭,而义天本人也被推为本宗之始祖。3、义天的求法活动还促成了一次两国佛教典籍之大流通。义天在渡海求法前,与净源便已互赠章疏。原本,义天入宋的原因之一是搜求诸宗章疏,以备编藏之用,但同时也随身带了不少经藏到中国来。义天在宋游学仅一年有余,但由此促成的义天与宋僧之间的互赠经籍活动却一直延续到他圆寂之年。考之于《大觉国师文集》(包括《外集》在内),自宋元丰五年(1082)起至义天入寂之年,即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约30年的时间里,宋僧赠送义天的诸宗章疏,仅就有名可指者而言,总共有48种,其中1种为求法前所赠,3种为求法期间所赠,其余44种为求法以后所赠。义天赠送宋僧的诸宗章疏总共有53种,其中3种为求法前所赠,7种为求法中所赠,其余43种为求法以后所赠。

实际上,义天求法中的经籍流通远不止这个数字。释史、碑铭中多以义天在求法期间搜求到的诸宗章疏为一千余卷,而他在求法后所上之《乞罪表》中却自称所得诸宗教藏为三千余卷。毫无疑问,《乞罪表》的数字要比其他文献、碑铭所载准确,因

而更权威。更有意义的是,义天所带回的这些教藏,“大半”为当时高丽国所未尝流行者(《仙凤寺大觉国师碑》)。义天送给宋僧的教藏,其实也远不止于上述数字,仅送给慧因寺的就达七千五百卷。无论这些教藏是来自于高丽国,还是义天入宋后就地印赠,其作用和意义都是很大的。

其次谈社会影响方面。海东僧人入华求法请益,几乎是一项长期性的文化活动。但至十世纪末,此项活动有戛然而止之势,延续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究其原因,乃是赵宋立国之初,所制定的方针是“先南后北”,契丹辽于是养成势力,并终于成为宋朝北方的劲敌。宋廷自顾尚且无暇,哪里还有力量外援?淳化五年(994)和咸平六年(1003),高丽国备受辽之侵扰,两次遣使人宋求援乞师屯境上为之牵制,宋廷均“但赐诏慰抚,厚礼其使遣还”,没有任何的军事行动,高丽国大失所望,并自此受制于契丹,与宋之朝贡于是随之中绝。由于两国政策上的掣肘,旅途上又无安全保障,求法活动寂然也便是势所必然了。契丹辽至道宗(1055-1101)统治时期,国运开始衰落。在这种形势下,高丽王朝与宋朝开始谋求恢复昔日的正常邦交关系。熙宁二年(1069),高丽派遣礼宾省与宋朝福建转运使罗拯联系,传达仰慕通好之意,宋朝亦通过罗拯,向高丽国喻以“供拟腆厚”之意,两国关系终又趋于正常。高丽文宗王晚年病笃,宋廷两次派遣御医前往就诊,并赠予诸多药材;每当宋帝生辰或即位,高丽均遣使致贺等。这种友好的关系、融洽的气氛,终于促成了义天的西行求法活动,换言之,为义天入宋游学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义天的游学求法活动既进一步体现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也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关系的持续发展。义天的求法活动与其之前或之后的僧人求法活动都大不相同。义天的求法活动,自进入宋朝国境的那天开始,便与官方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义天首先请得宋朝廷的敕许,然后每到一个新地方,都向当地政府进“状”,谋求地方政府的支持。而宋朝廷则几乎是把义天的求法活动当成一项“外交使节活动”来对待,一路上均派高级官员“导引”、“伴送”。皇帝在宫廷接见,此外还派出中使到义天的旅宿地传喻慰问、赐物、赐御斋;地方僧俗也把义天当贵宾迎接。双方的行为都超出了纯宗教的性质,都在显示一种姿态,传递一种信息:希望两国友好,重视两国关系正常化。正是这种力量,使义天的求法活动得以高速、高效地进行,最后取得圆满成功。而义天的活动,也在宋朝僧俗中传为佳话。苏轼曾赠诗杨杰,说杨杰一路伴送义天是一种“王事”活动,亦即“国事”活动。杨杰在给义天的赠诗中写道:“我愧陪弥天,才辩非凿齿。留赠明月珠,光透玉壶里。四海同一家,何此亦何彼。”

“四海同一家,何此亦何彼”,这是义天求法活动客观上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是这次求法活动的政治意义所在。

三、义天的编藏和撰述活动

(一)集《圆宗文类》

《圆宗文类》是义天主持编辑的一部类书。圆宗，此处是指主弘圆融具德法门的佛教宗派华严宗，而不是指演说圆顿之旨的天台宗。文类即文章分类、文章之类编。义天出家后即从景德王师烂圆习华严学。烂圆入寂后，义天又继承其法席，独立主讲华严学。自宋求法还国后，被正式任命为兴王寺之住持，继续讲演华严，“周于十遍”。在教学与弘法实践中，义天深感其中之困难很大。他在《圆宗文类序》一文中这样叙说道：“但以至理幽微，群言汗漫，问答之际，援引颇难。况近世吾宗好异之輩，弃本逐末，臆说纷然，遂令祖师玄旨，壅而难通者十七八焉。”于是乎，“精于教观者，岂不为太息矣”。一方面，教理深奥，而经籍浩繁，难于检阅精研；另一方面，弃本逐末，臆说异议，混淆视听，更给弘法增设了一道障碍。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义天在国王的支持下，乃“集义学，俾议纂修”此宗之类书。纂修的方法是“略彼广文，为兹要览，以类鸠集”，也就是从浩繁的华严宗文库中，筛选出最能集中概括本宗义理宗旨、师承、仪轨、修习方法、弘法业绩等内容的精彩部分，然后分类编为二十二卷。书成奏上，国王赐名曰《圆宗文类》，并命义天为制序言。至今残存三卷，即第一卷、第十四卷和第二十二卷。后两卷载于日本藏经书院刊印的《续藏经》中，另一卷由《朝鲜佛教通史》之作者李能和先生（尚玄居士）保存。李氏于其著作中曾将第一卷末第一页及第三页参校僧录载，由此可知以下三点：其一是《文类》修纂的确存在一个由高僧组成的班子，其成员包括道邻、慧宣、慧琦、缙秀、景宣、觉之、唯严、承诤、精莹、禀贤、乐真、理应、俊诏、处元、处闻等；其二是文章筛选出来后，经过上述高僧一再“详校”，义天最后编定，然后开版印行；其三是从义天所署“兴王寺住持传贤首教观兼天台教观南山律钞因明等论等观普应圆明福国慈济广智开宗弘真祐世僧统臣”头衔看，《文类》一书集成于文宗世，《序》亦撰成于文宗末年，但最后重校、刊行时间，应在求法还国后住持兴王寺之末年，此时宣宗尚未卒，具体时间约当于宣宗十年（1093）前后。此书刊行后，义天曾给宋僧辩真、道亨二人各赠寄一部，赠送时间都在公元1095年前后，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重校、刊行之时间。同时也说明此书曾流传于中国。残卷的内容有：宋僧净源所述之《策门三道》（括“贤首判论”、“判教有差”、“儒释言性”）、《贤首国师寄海东书》、《杭州华严经社石记》等，内容相当广泛，资料亦很宝贵。

《圆宗文类》实际上是华严学之“要览”，因而也就是一本华严宗新学徒入门、修